

商业企业在减少和 预防武装暴力中的作用

阿希姆·文曼*著 / 张腴心**译

摘要

本文通过“武装暴力”的视角关注冲突及脆弱环境下的商业企业行为，并探讨商业企业在减少和预防武装暴力（以下简称防暴减暴）战略中的作用。本文认为过去十年中武装暴力模式的转变要求我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该问题，传统上，对其进行讨论的语境是“商业企业与和平”或“商业企业与冲突”，以及与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相关的武装暴力。本文试图更好地理解各相关方如何看待工商业界在减少武装暴力中的作用，并在各种学术和实践部门之间“连点成线”，以找到防暴减暴战略在跨部门和跨机构的切入点。本文提出在武装暴力的成本代价以及民间观测方面存在这样的切入点。

关键词：商业企业；武装暴力；脆弱性；减少和预防武装暴力（防暴减暴）

关于对工商业界在暴力和脆弱环境中作用的思考近十年来俯拾皆是，但其迄今尚未明确采用一种武装暴力的视角。这种视角所提议的，是以一种整

* 阿希姆·文曼 (Achim Wennmann) 博士为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所冲突、发展与和平建设问题中心的研究员。特别感谢日内瓦武装暴力和发展宣言组织秘书处为本研究提供资助。秘书处将于近期出版一份与本文相关的较短的概要。作者还要感谢Vincent Bernard, Luigi de Martino, Mariya Nikolova和一位匿名评阅人的意见。

** 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

体性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战争、武装冲突和刑事暴力,¹它带有明确的操作性目的,即通过所谓的减少和预防武装暴力(防暴减暴)项目在特定的背景下改善针对武装暴力的策略。迄今为止,“商业企业与和平”或“商业企业与冲突”领域的讨论主要关注的还是公司在国际或国内战争、违反人权的行为以及地方性和平建设举措中的作用。另外,大多数晚近的多方参与实践关注的都是“鲁吉原则”²中发展出来的“保护、遵守、救济”框架,或是《安全和人权自愿原则》³的实施。因此,目前的分析和实践存量是从一种较为传统的“冲突”视角——即关注于国际或国内战争——以及从“权利”进路中发展起来的。

探讨通过武装暴力视角来看待暴力和脆弱环境⁴中的商业企业参与所具有的潜力是很重要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它是战略性跨部门合作的操作性框架,超越了目前“权利”进路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其次,它在特定的情况下将关注点从宣言性的层面转移到了操作性的层面。它因此指向了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趋势,即围绕着“原则”和“指导方针”的自发性努力已经达到了某种饱和状态,未来的努力需要更多地关注改变实实在在的实践。⁵再次,对于性质不断变化的、复杂的暴力冲突之下的行为,武装暴力视角的适应性远胜其他。以下事实可以为这一变化之证,即每十例被报导的暴力死亡中,仅有一例是发生在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情况下的。⁶最后,该视角涵盖了大量前景看好的实践,而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将这些实践与艰难市场中的商业企业行为联系起来。这些实践突显出整合的国家或城市防暴减暴项目在巴西、哥伦比亚或南非等国的兴起。

1 Geneva Declaration Secretariat (GDS), *Global Burden of Armed Violence*, GDS, Geneva, 2008.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rmed Violence Reduction: Enabling Development*, OECD, Paris, 2011.

2 UN Doc. A/HRC/17/31, 《工商企业与人权: 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 2011年3月21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1年6月16日一致通过。

3 Available at: http://www.voluntaryprinciples.org/files/voluntary_principles_english.pdf (last visited 14 December 2012).

4 当“政治、社会、安全和经济风险与有组织的暴力联系在一起”时, 就可以理解为存在“暴力和脆弱的环境”。这尤其会发生在“国家或机构缺乏足够的能力、担当或正当性来调和公民团体之间以及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而使其易于遭受暴力的时期”。Se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1, pp. xv-xvi.

5 Brian Ganson and Achim Wennmann. *Confronting Risk, Mobilizing Action: A Framework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Large-scale Business Investments*,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Berlin, 2012.

6 GDS, *Global Burden of Armed Violence: Lethal Encount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1, p. 1.

就与暴力和脆弱环境下的商业企业行为相关的武装暴力视角，本文将提供一个探讨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旨在让商业企业和“权利”团体更多地了解由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经合组织）以及日内瓦武装暴力和发展宣言组织所提出的武装暴力视角。它还将强调该视角作为在暴力环境下实现跨部门合作之工具的潜力。本文的“商业企业”是指进行合法或合理的货物和服务融资、生产或贸易的私营公司——无论当地的或国际的。虽然本文承认在很多暴力和脆弱的环境下，正式与非正式、公与私、或是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但本文并不关注与有组织犯罪相联系的私营主体。本文也不关注以提供安保服务为业的私人保安公司。本文将武装暴力理解为“通过武器或爆炸物，针对个人、团体、社会或国家蓄意使用武力（实际使用或威胁使用），该种武力使用损害了人本安全（people-centered security）以及（或者）可持续发展”。⁷这一工作定义同时涵盖了实施于武装冲突或非冲突情况下的武装暴力。

本文分五个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将描述武装暴力视角的基本要素。第二部分将回顾商业企业和武装暴力这一问题上现有的认识情况。第三部分将论及商业企业避开武装暴力、在武装暴力中以及针对武装暴力而采取的不同形式的行为。第四部分将选取某些商业企业实践而置诸武装暴力视角之下。第五部分探讨支持防暴减暴项目的跨部门合作的两个契合点。总体来说，本文承认商业企业在各种暴力环境下曾经发挥过众多不同的作用。本文还强调商业企业在防暴减暴项目中的作用并不必然在于对旨在减少武装暴力的单独存在的公司项目进行调查或加以强化，而是在于在特定环境下将商业企业置于综合性的策略之中。

武装暴力视角

武装暴力视角是经合组织和日内瓦宣言组织一项持续多年的进程的结果。它是通过与发展方面的从业者磋商而发展出来的，且以在冲突中、冲突后以及其他受暴力影响的环境下关于减少武装暴力的十余年的实践为基础。

⁷ GDS, above note 1, p. 2.

该进程的发展是基于武装暴力会阻碍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一认识，并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即武装暴力的显著减少可以带来发展方面的重大利益。

武装暴力视角提出了对抗武装暴力的一种战略上的整体性进路。该进路所基于的前提是“要推动预防和减少武装暴力的有效且实际的措施，有赖于发展可靠的信息并分析其原因和后果、及其在多个层面上的相互关系”。⁸总的来说，武装暴力视角涉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性的层面，并基于四个要素(见图1)。这些要素是：

- 受武装暴力影响的人和社区；
- 武装暴力的实施者及其使用武装暴力的动机；
- 武装暴力的工具，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以及
- 界定大环境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这种大环境使得武装暴力成为可能或使得人们免于武装暴力。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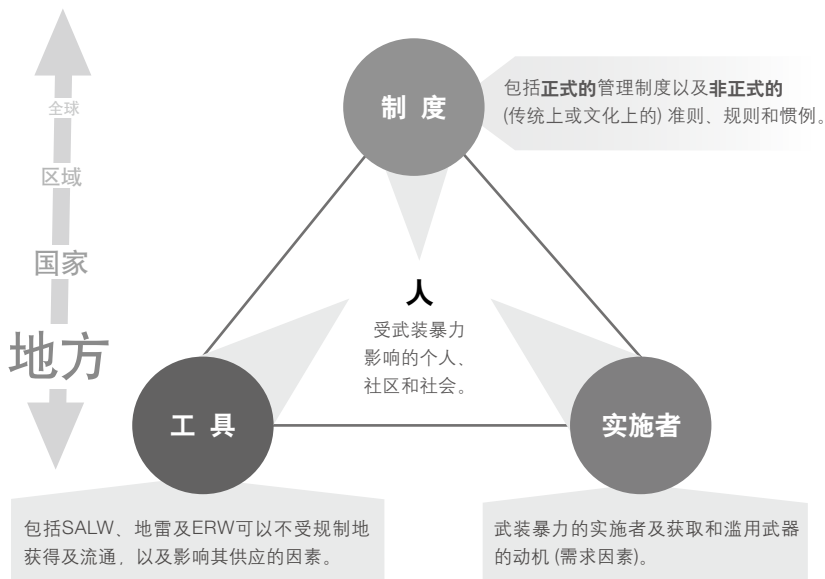


图1：武装暴力视角¹⁰

8 OECD, *Armed Violence Reduction*, above note 1, p. 49.

9 同上，第49-50页。

10 SALW是指小武器和轻武器，ERW是指战争遗留爆炸物。

武装暴力视角“强调暴力是如何超越不同的发展部门的，并着重指出跨部门和综合性应对方式的潜力”。¹¹该视角还承认武装暴力的多种面向，包括“暴力实施者那同时存在的不断变化的动机，以及不同形式的暴力之间的联系”，这包括有组织的（集体的）或人际的（个人）的暴力，以及冲突中的（以政治为动机的）和犯罪性的（以经济为动机的）暴力。¹²

该框架还指出了在个人、关系、社区和社会层面一系列与武装暴力相联系的风险因素——这一概念模型亦被称为武装暴力的“生态学模式”。¹³在个人层面，经常与暴力相联系的有年轻人、男性、行为控制欠佳、攻击性行为史、受教育程度低、滥用药物，或是曾经遭受过暴力。在关系层面，暴力被认为植根于家庭监管缺位、遭受惩罚、家庭归属感的欠缺、社会经济地位低，或是与行为不良者交往。在社区层面，与暴力有关的包括社会财富不足；失业率高、帮派、枪支和毒品现象层出不穷；以及酒精饮料的可及性。而在社会层面，关键性的因素是治理的质量、社会保护方面的法律、收入不平等、城市发展，以及惩罚暴力的文化。

防暴减暴项目展示出极大的多样性、朝气、干劲以及社会创新性。与此同时，他们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包括：

- 使预防冲突、犯罪和武装暴力的方式创造性地适用于特定的情况；
- 重点关注地方层面，因为这是人们最直接地经历武装暴力的层面，同时也是证据显示出现了最有希望的努力的层面；
- 重点关注降低影响地方动态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风险因素；以及
- 有助于保证地方性预防努力之可持续性的国家层面的努力，尤其是保证从不同地方的情况中吸取教训、在不同的机构和部门中发展防暴减暴的愿景，以及帮助排出优先性和进行协调。¹⁴

11 同上。

12 GDS, above note 1, p. 18.

13 《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WHO，日内瓦，2002年，第14-17页。

14 OECD, above note 1, p. 17.

一份对有前景的实践的评论指出：

最有前景的防暴减暴项目是这样一些项目，它们将跨越多个部门的一系列暴力预防和减少战略加以整合，并有的放矢地针对导致武装暴力的关键性风险因素……它们将防暴减暴目标和行动融入区域性、国家性以及次国家层面的发展计划和项目之中。¹⁵

防暴减暴项目经常被区分为三种类型。直接项目针对的是使武装暴力成为可能的工具、行为以及制度环境；非直接项目针对的是造成武装暴力的“周边”或“结构性”风险因素；还有更广泛的发展项目，虽然其首要目标、甚至次要目标都并非预防和减少武装暴力，但还是可以带来颇为重要的回报。这三种类型并不必然是非此即彼或彼此隔绝的。事实上，很多前沿性的防暴减暴项目会有意模糊直接和间接方式的界限——比如在关注降低武器的可获取性及关注有风险的男性青年的同时，又通过有针对性的就业计划、继续教育项目、心理支持、甚至家庭计划行动来努力降低滥用的可能性。¹⁶

从地方商业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的角度来说，直接参与对抗武装暴力的努力显然并非什么新鲜事。事实上，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商业企业已经参与了防暴减暴项目。¹⁷此外，在和平建设实践中，当地的行为人有很长的与商业企业合作来终止暴力及巩固和平的历史。¹⁸但以下这一点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即武装暴力视角——及与其相联系的来自于防暴减暴项目的实践——打开了加强多部门合作的机会，这种合作对于打击和预防武装暴力是很必要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声称其有能力有效地独自进行这种努力。

下一部分将开始从总体上阐释商业企业和武装暴力之间的联系；再后面的部分将再次与武装暴力视角联系起来。

15 Paul Eavis, *Working Against Violence: Promising Practices in Armed Violence Reduction and Prevention*, GDS, Geneva, 2011, pp. 57-58.

16 同上，第22-23页。

17 P. Eavis, *Working Against Violence*, above note 15, pp. 9, 57.

18 Jessica Banfield, Canan Gündüz, and Nick Killick (eds), *Local Business, Local Peace: The Peacebuilding Potential of the Domestic Private Sector*, International Alert, London, 2006.

商业企业和武装暴力

“武装暴力”这一概念目前还没有在关于暴力和脆弱环境的大量文献中得到明确的体现。近二十年来，这些文献主要关注的是一系列重叠的主题，比如在国际或国内的战争中商业企业的角色以及对商业企业的政策因应；商业企业在冲突地区违反人权的参与；在武装冲突和脆弱情势下的规制框架、各相关方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商业企业的自我规制；工商业界在和平建设中的作用；商业企业在和平斡旋中的作用；商业企业和社区的关系；以及工商业界在冲突后国家的发展。¹⁹

关于这些主题的文献代表了关于商业企业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及和平建设进程中作用的大量不同的视角和案例研究。这些努力也促进了一些政策倡议，像打击“冲突钻石”的金伯利证书项目、采矿业透明度行动计划，还有前文提到的“鲁吉原则”和《自愿原则》。这些讨论和实践是与21世纪初的一些武装冲突（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的特点紧密相连的，这些武装冲突暴露了国家和非国家武装行为人与自然资源开采之间的联系，以及武装冲突地区向全球经济的融入。²⁰这些文献和实践主要采用的是与国际或国内战争相关的分析方式，并主要是从遵守、自我规制、和平建设或人权的角度来探讨该问题，而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不同视角之间的联系或将其融为一个更具整体性的进路的可能性。

在犯罪预防方面则发展起来了关于武装暴力和商业企业的更有针对性的研究。²¹这方面的文献强调“暴力犯罪和对犯罪的认识能够影响到公司吸引顾客、招收和留住雇员、提升工作场所的士气和保证其员工生产力的能力，

19 For a review see Mary Porter Peschka, *The Rol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Fragile and Conflict-Affected Stat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1.

20 See for instance Mats Berdal and David M. Malone (eds), *Greed and Grievance: 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 Lynne Rienner, Boulder, 2000. Karen Ballentine and Jake Sherma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med Conflict: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Lynne Rienner, Boulder, 2003.

21 For a review see Laura Capobianco, *Sharpening the Lens: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in Crime Preventi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Montreal, 2005, pp. 13-14.

有时候还包括其保持营业状态的能力”。²²专门关注针对商业企业的犯罪（入室抢劫、店内偷窃、盗窃、欺诈）的研究发现商业场所面临着比私人住所更高的受害风险。²³但是，在犯罪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存续的影响方面，这些文献仍嫌薄弱。²⁴最近的研究尤其关注了扩展公私合营商业企业方面的证据库，以强化社区的安全，作为更广泛的国家性犯罪预防战略的一部分。²⁵

鉴于田野调查和实践的这种现状，现在是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商业企业和武装暴力的关系，我们知道什么？

商业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

首先，我们知道很多种类的商业企业都在暴力环境中运作。作为国际公司在暴力环境中的存在和利益的代表，表一给出了有着高武装暴力程度的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和汇款水平。这些数据说明高暴力的环境并没有超出私人金融流动所能及的范围，不管是FDI形式的公司投资流动，还是以汇款形式发生的来自私人个人的流动。²⁶这并不是说如果暴力程度降低了，这些流动就会增加，而是意味着尽管存在着武装暴力，还是会有投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表一的数据是国家层面的暴力指数，可能会掩盖一国内部地区或城市之间的重要差异。在次国家层面，这些数据可能会意味着高度暴力和集中的工商业存在空间上的重叠，比如约翰内斯堡或圣保罗，二者分别是南非和巴西的工商业中心，同时也是高度暴力环境的中心。

22 同上，第13页。

23 Jan J.M. van Dijk and Gert J. Terlouw,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s Victims of Fraud and Crime', in *Security Journal*, Vol. 7, 1996, pp. 157-167.

24 L. Capobianco, above note 21, p. 13.

25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ICPC), the World Bank, Bogota Chamber of Commerce (BCC), and Instituto Sou da Paz (IS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Community Safety: Guide to Action*, ICPC, World Bank, BCC, ISP, Montreal, Washington D.C., Bogota, São Paulo, 2011.

26 FDI和汇款流动性迥异，前者大量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部门，而后者所体现的是劳工或移民直接寄给母国的家人的钱。汇款可以增强家庭的适应能力，还可以体现对微型或小型家庭企业的投资。

表一：高武装暴力程度国家的FDI和汇款资金流，2004-2009年平均值²⁷

	每十万人中暴力死亡的人数	FDI(美元, 百万)	汇款(美元, 百万)
萨尔瓦多	61.86	191	3,326
伊拉克	59.40	913	249
牙买加	58.10	835	1,932
洪都拉斯	48.60	699	2,231
哥伦比亚	45.77	7,788	4,009
委内瑞拉	44.64	671	146
危地马拉	43.20	583	3,685
南非	38.39	4,629	746
斯里兰卡	37.09	457	2,434
莱索托	33.67	83	610
中非共和国	32.95	52	n/a
苏丹	32.30	2,366	1,767
伯利兹	31.34	128	63
刚果民主共和国	31.29	973	n/a
斯威士兰	26.47	59	93
刚果共和国	26.10	1,157	14
索马里	26.03	75	n/a
巴西	25.85	26,268	4,179
马拉维	25.47	94	n/a

国际商业投资在很多暴力国家的继续支持了如下观点，即武装暴力只是定义商业决策的一系列因素之一。这些因素可能包括该国法律制度、银行部门和司法制度的质量，以及投资者的商业目标和一国地理及地质情况及其劳动力的技能状况的适配性。因此，对于主流的投资项目来说，决定投资意愿的并不见得是冲突的终结或武装暴力的减少，而是一个正常运行的国家的建设以及其他的当地特殊因素。²⁸后面这点突出体现了对于商业投资来说，整体的政治和立法环境是何等重要。

商业企业对武装暴力的态度和看法

关于表一的分析在2006年的一项调查中得到了印证，该项调查是针对177位经理人就其对发展中的经济体中的风险持何态度展开的。该调查确认了公司正日益加强努力应对政治性的和运营性的危机管理。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确认其在2004到2006年间加强了此种努力。被认为“最严重”和“严重”的排名前五位的风险是关于政权的稳定性、东道国的经济问题、行贿和腐败、政策或执政党的突然更换，以及不遵守合同。在十一个风险因素中，战争和社会动乱排名第七。该调查并未将“武装暴力”作为一个特定的风险因素种类而纳入。²⁹鉴于商业企业的多样性，其对武装暴力的态度也可能大异其趣。就在冲突国家的投资而言，人们发现公司的态度取决于四个主要因素：

- 在具体的受冲突影响地区的有形资产数量（比如以道路、建筑、产业链等不动产形式存在的大规模的、位于特定地点的投资）；
- 公司的核心业务（比如自然资源开采、服务、建筑或交通）；
- 投资背后的战略（比如为国际或国内市场而生产的产品，或使用整合后的生产周期），以及

27 关于武装暴力的数据来源于日内瓦宣言组织秘书处。本表格包括了以十万人中的暴力死亡率来计算最为暴力的十九个国家。GDS，前注1，第53页。FDI和汇款的数据是基于世界银行的2004-2009年期间以下两个指标的年度平均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即“外国直接投资净额（BoP，现价美元）”以及“劳工汇款和雇员赔偿接收额（现价美元）”。

28 Ashraf Ghani, and Claire Lockhart, *Fixing Failed States: A Framework for Rebuilding a Fractured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8, p. 133. John Bra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onflict-Affected Contexts*, International Alert, London, 2010, p. 2.

29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Operating Risks in Emerging Markets*, EIU, London, 2006, pp. 2, 3, 5.

- 退出成本的水平 (由不动产和移动资产之间的差额决定)。

这些特性方面的变化决定了武装暴力对公司造成的成本高昂的后果，而这又会决定公司在应对这种暴力方面的态度。根据这一分析，像能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就会更容易受到武装暴力的影响，而金融、教育、职业服务、电信或建设则要显得比较不易受影响。³⁰

关于暴力犯罪对商业影响的文献也肯定了上述武装暴力之影响的区别性。尤其受到影响的行业包括旅游、零售、交通、经销和仓储业。³¹此外，在美国大城市的低收入社区，日益恶化的武装暴力程度对服务的提供造成了严重的影响。³²

商业企业的风险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装暴力在次国家层面的分布。如果公司的主要活动是在首都，而大部分武装暴力发生在边远地区，那么这种暴力对商业运作的影响就微乎其微。因此，从国家层面总计的FDI和武装暴力评估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尽管有着很高的武装暴力程度，却仍然维持着相对较高的FDI水平。

避开武装暴力、在武装暴力中以及 针对武装暴力的商业企业行为

鉴于有的公司在暴力和脆弱的环境下存在，因此问题在于它们如何让其存在或运作适应武装暴力？总体来说，公司可以选择调整其经营方式，避开武装暴力、在武装暴力中或是针对武装暴力来进行运作。³³

30 Andreea Mihalache-O'Keef, and Tatiana Vashchilko, 'Foreign Direct Investors in Conflict Zones', in Mats Berdal and Achim Wennmann (eds), *Ending Wars, Consolidating Peace: Economic Perspectives*, Routledge for IISS, Abingdon, 2010, pp. 137-155.

31 L. Capobianco, above note 21, p. 15.

32 这项研究结果所基于的研究使用了1987至1994年间五个美国大城市商业行为方面的纵向数据。Robert Greenbaum and George Tita, 'The Impact of Violence Surges on Neighbourhood Business Activity', in *Urban Studies*, Vol. 41, No. 13, 2004, pp. 2495-2514.

33 这一分析借鉴了冲突敏感性发展行动中发展从业者的选择。See Jonathan Goodhand, *Violent Conflict, Poverty and Chronic Poverty*,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6,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2001, pp. 30-31.

避开武装暴力的公司

大多数的主流公司会避开武装暴力，即它们会因为武装暴力而退出或暂时中止业务。因此，采用这种方式来调整其经营的公司不会有兴趣直接参与减少武装暴力的行为。不过，公司可能会极不情愿撤出其业务。因为它们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运作，其退出也就代表着其竞争对手有了进入市场的机会。商业从业者的这种潜在的可替代性突出了在冲突和脆弱环境下总体上有着良好声誉记录的公司坚持下去的重要性，因为如若不然的话，大门就会向有意背离负责任的业务活动的利润追求者敞开。³⁴关于暂时中止业务还有一点：较大的公司可能有资源来承受长期的中止，但生产和贸易的长期中断可能让中小型公司的生存面临危险。

在武装暴力中运作的公司

公司也可能决定在武装暴力的情况下运作并试图最小化武装暴力对其运营和业务的影响。对于较大的公司来说，这意味雇佣私人保安公司来对其加以保护，在有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成本因素。比如，据估计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公司将其经营预算的9%都花在了安保上。³⁵中小型商业企业无力像大投资者那样支付保安或分散风险。牙买加的犯罪受害调查显示，相对于中型（7.6%）和大型公司（0.7%）而言，较小的公司要将其收益中更高的份额（17%）花在安保上。³⁶而且，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指出，小型零售业最易成为受害者，这包括了犯罪的经济以及心理代价。³⁷因此，相对于较大的公司，在武装暴力中运营对于较小的公司来说问题要大得多。

34 John Bray, 'Attracting Reputable Companies to Risky Environments: Petroleum and Mining Companies', in Ian Bannon and Paul Collier (eds), *Natural Resources and Violent Conflict: Options and Action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3, p. 309.

35 Peter W. Singer, *Corporate Warriors: The Rise of the Privatized Military Indust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2003, pp. 81-82.

36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and the World Bank, *Crime, Violence, and Development: Trends, Costs and Policy Options in the Caribbean*, UNODC and World Bank, Vienna and Washington D.C., 2007, pp. 48-49.

37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BCC), *Setting Business Free from Crime: A Crime Against Business*, BCC, London, 2004. Santina Perron, *Crime Against Small Business in Australia: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Canberra, 2000.

针对武装暴力的驱动因素进行运作的公司

公司还可能针对武装暴力的驱动因素进行运作，也即其可能在防暴减暴中发挥各种作用。正如一位哥伦比亚商业企业家所说：“并不是说我们都两手交叉坐着，什么也没干，或是说我们都住在迈阿密”。³⁸商业企业与和平建设方面的文献中的案例证据也显示，商业企业可以通过在不同的社区以及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沟通、直接与交战方进行谈判、提供调停和信息、作为支持和平的拥护者、为和平进程出（一部分）钱、帮助发放人道援助、加强当地经济、建立信任、促进责任的承担以及限制对冲突的财政支持的方式来针对武装暴力的驱动因素进行运作。³⁹如果商业企业代表被认为是非政治的而且与谈判的结果没有利害关系，那他们还可以作为冲突方之间的协调人。⁴⁰

中小型商业企业和大规模投资者可以在防暴减暴中发挥作用

在避开武装暴力、在武装暴力中或针对武装暴力而加以调整的战略中，有两种公司在参与防暴减暴方面尤其具有潜在的利益。第一种是本地的中小型商业企业，因为它们无法仅靠自己来隔绝掉武装暴力，所以要依靠更广泛的努力来终结暴力，以便维持商业企业的运营。这里可能尤其有机会强化社区层面的防暴减暴，因为中小型商业企业是以家庭和社区成员之间的纽带为信任基础来启动商业交易的。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加强社区纽带并改善生活水平，从而直接影响到人们在暴力之后的生活经验。

第二种商业主体是开采业、农业商业企业和基础设施商业企业。这些类型的商业企业依赖于特定的地点因素（自然资源的存在、农业用地、建筑、

38 Angelika Rettberg, *Business-Led Peacebuilding in Colombia: Fad or Future of Country in Crisis?*, Crisis States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58,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2004, p. 21.

39 关于企业参与和平建设的各种不同的案例研究，see J. Banfield *et al.*, above note 18; Jane Nelson, *The Business of Peace: The Private Sector as a Partner in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The Prince of Wales Business Leaders Forum, International Alert, 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pp. 73–140; Derek Sweetman, *Business,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eacebuilding*, Routledge, Abingdon, 2009, pp. 41–47.

40 Salil Tripathi and Canan Gündüz, *A Rol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in Peace Processes? Exampl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ird-party Mediation*,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 Geneva, 2008, p. 25.

道路和机场的地点等)。因此，它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某个特定的地点深陷武装暴力的情形，因为投资的程度可能太高，以致于其无法退出。迄今为止公司处理“受陷”投资的方式都是倾向于安保应对：比如雇佣保安公司来阻挡对特定场所的暴力攻击。但这些安保提供者自己可能很快就变成武装暴力复杂动态的一部分。鉴于缩小安保支出成本的压力、与此种实践相联系的负面报道，及其在减少针对特定场所的暴力风险方面有限的长期效应，一些大规模的投资者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非安保性的应对措施。比如，这包括与武装集团的非正式的调停和对话模式，以及在公司和社区之间达成全面协议的尝试。这一发展中的实践可能表明存在这样一些小部分的商业商业企业，它们可能会有参与防暴减暴的潜在兴趣和能力。

总之，中小型商业企业以及大规模投资者都强调商业企业在面对武装暴力时的潜在的灵活性。

商业企业行为和武装暴力视角

通过武装暴力视角来观察商业企业行为可以解释这种行为是如何与该视角四个因素中的两个相关的：即受武装暴力影响的人和社区以及武装暴力的实施者。比如说，当公司的运营或其职员面临风险的时候，公司就可能直接参与减少武装暴力的行为。据说在哥伦比亚，首席执行官 (CEO) 被绑架这一事实促进了商业企业领导人对控制犯罪和减少暴力的举措的参与。⁴¹此外，将武装暴力看成威胁到投资项目底线或项目存续的风险可以使商业企业有动力迅速行动。尼日利亚日益升级的冲突就使得与武装团体的对话成为了公司短期内的当务之急，以保护其投资的资产。⁴²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商业企业参与减少武装暴力行为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事会或CEO如何认识公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作用。有些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商业企业纯粹是以利润驱动的，利润是公司的终极目标。但也有领

41 A. Rettberg, above note 38.

42 来自与作者的私人交流。

导强调，在一个有前瞻性的公司里，利润是达成商业目标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些目标是提供顾客需要或想要的货物或服务，而这些货物和服务需要不断创新以保持竞争力。⁴³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商业企业领导清楚地知道商业企业与政治的关联丝毫不亚于其与生意的关联。当公司的运营对东道国有战略重要性，或是当政治和商业精英错综复杂地互相交织——甚至达到分割“公共”和“私营”部门已经意义不大的程度之时，情况尤为如是。

另一种态度与商业企业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及由之而来的对稳定运营环境的需求相联系。萨尔瓦多的两个主要帮派之间所达成的停火可以作为说明此点的一个例证。虽然野蛮萨尔瓦多人 (*Salvatrucha*) 和十八街黑帮之间的停火使得谋杀率下降了32%至40%，但对家庭和中小型商业企业的敲诈勒索却一如既往。这是因为敲诈勒索仍然是黑帮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及其为了资助关在监狱里的家庭成员而支付法律服务费的经济手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企业应当会对更具综合性的防暴减暴战略感兴趣，这种战略不仅降低杀伤行为的数量，而且还通过长期进程来应对武装暴力的经济和社会面向。⁴⁴

出于说明的目的，接下来的两小节将透过武装暴力视角来考察商业企业行为。我们还是同样重点关注四个因素中的两个：受武装暴力影响的人和社区以及武装暴力的实施者。总体来说，作为减少针对公司或雇员之暴力的战略的一部分而直接打击武装暴力工具的努力比较不常见。不过正如上文提到过的，有的公司已经作出努力来避免调动武装暴力的工具并通过非安措施来应对暴力或暴力的威胁。而且，商业企业行为是非常多样化的，肯定还有空间对更广泛的商业企业战略样本及其在武装暴力视角中的位置做更具系统性的分析。

43 Mark Moody-Steward, 'Foreword', in Oliver F. Williams, C.S.C. (ed.), *Peace Through Commerce: Responsible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The Ideals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2008, p. xi.

44 Randal C. Archibold, '“Gangs” Truce Buys El Salvador a Tenuous Peace', in *New York Times*, 27 August 2012. Committe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El Salvador, 'Salvadoran Government Accused Negotiating with Gangs, After 40% Drop in Murders', 20 April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cispes.org> (last visited 24 August 2012).

受武装暴力影响的人和社区

对于公司-社区关系方面的商业企业行为，存在着数量惊人的跟踪记录。⁴⁵传统上，这方面的努力是与慈善性的投资相联系的，慈善性投资现在仍然作为建构公司和社区关系的一种工具而被使用，而且通常构成公司社会责任行动的一部分。一项研究发现，就七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犯罪和暴力预防项目来说，金钱捐助仍然是商业企业参与的最常见的形式。在46个项目中，45个收到了来自私营业主的捐献，不过很多公司也直接参与到了其提供大量资助的项目的执行之中。大多数项目都是立足于当地的防暴减暴项目，因此其关注的都是相关公司的直接运作环境。⁴⁶

除了这种慈善努力之外，公司还通过很多其他方式来参与加强社区能力。⁴⁷举例来说，这包括在社区制订公共安全计划或其他防暴减暴行动的时候分享其管理及技术专长、为邻里会议提供办公场所、资助邻里活动以增强社区凝聚力，以及制订公司政策来保证职场的多样性和更大的社会融合目标。在南非和巴西，这种类型的努力已经与国家、城市或公民社会参与人的既存防暴减暴项目相伴随行了。⁴⁸

这种社区层面的防暴减暴很容易与商业企业界保障稳定运营环境的趋势联系起来。⁴⁹至少在公司政策层面，大多数活跃在脆弱环境中的跨国公司承认，以有助于冲突和武装暴力预防的方式来管理其经营是最符合其利益的。当公司决定在某个地方大量投资时，在冲突预防方面的早期投资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明智的长期公司战略。而通过减少与中断运营、财产毁损或人员伤亡相关的风险，这种战略又反过来可能对公司的收支状况产生积极影响。⁵⁰

45 Luc Zandfliet and Mary B. Anderson, *Getting it Right: Making Corporate-Community Relations Work*, Greenleaf Publishing, Sheffield, 2009. David Brereton, John Owen, Julie Kim, *Good Practice Not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greements*, Centre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Mining,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2011.

46 ICPC *et al.*, above note 25, p. 33.

47 关于南非的案例研究，see Lloyd Vogelmann, *Reducing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The Contribution Business Can Mak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Pretoria, 1990.

48 L- Capobianco, above note 21, p. 20.

49 Brian Ganson and Achim Wennmann, *Safe Communities, Resilient Systems: Towards a New Action Framework on Business and Peacebuilding*, Brief No. 5, Geneva Peacebuilding Platform, Geneva, 2012.

50 Brian Ganson, *Business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Action*, Paper No. 2, Geneva Peacebuilding Platform, Geneva, 2011.

这一趋势可以从公司内部兴起的从安全运营到安全社区的认识转变中得到例证。安全社区的概念不只是关注与公司有直接联系的人员、资产和运营的安全及其运作，而且还指更广泛地投资于社区应对各种来源的冲突和风险因素的能力，在更广泛的和平与稳定之中同时保护公司和社区的利益。⁵¹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有些公司将自己定位为社区的成员，发展自己同时与公职官员和受其运营影响的社区合作的能力。例如，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投资中，巴西矿业公司淡水河谷 (Vale) 公司通过兼容并包的努力与卡纳克 (Kanak) 族人接触，从而达成了—个可持续发展协议，该协议包括教育、培训和文化活动的条款，并成立了一个当地部落占有一席之地多方委员会，来监督淡水河谷运营的环境问题 (environme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s)。⁵²

大量的案例分析证明，安全的对话和争端解决场所对公司和社区都同样重要。⁵³还有一种新兴的实践是将许可和申诉程序置于社区而非公司之中，包括更多地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分享决策控制权。⁵⁴

这种实践说明很多私营公司可能已经长年进行防暴减暴实践，哪怕它们并未将其称作防暴减暴。对防暴减暴项目的一项全球性评估也产生了类似的研究结果，该评估强调，很多发展项目都包含了冲突预防、和平建设、或安保和安全的优先考虑，虽然这些都没有被称为是防暴减暴干预措施。⁵⁵

武装暴力的实施者

虽然直接接触叛乱团体、青年黑帮或军事派别是比较少见的公司实践，但还是有公司代表——或其中间人——与暴力实施者接触的例子。不过对这

51 Brian Ganson and Achim Wennmann, *Operationalizing Conflict Prevention as Strong, Resilient Systems, Approaches, Evidence, Action Points*, Paper 3, Geneva Peacebuilding Platform, Geneva, 2012.

52 Rafael Benke, *Vale New Caledonia: Negotiat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ct with Local Stakeholders*, 2010, available at: http://baseswiki.org/en/Vale_New_Caledonia,_Negotiation_of_a_Sustainable_Development_Pact_with_Local_Stakeholders,_Canada_2008 (last visited 24 May 2012).

53 Compliance Advisor Ombudsman (CAO), *Annual Report 2010 and Review FY 2000-10*, CAO, Washington D.C., 2010.

54 Lisa J. Laplante and Suzanna A. Spears, 'Out of the conflict zone: the case for community consent processes in the extractive sector', in *Yale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Law Journal*, Vol. 1, 2008, p. 115.

55 Robert Muggah and Achim Wennmann (eds), *Investing in Security: A Global Assessment of Armed Violence Reduction Initiatives*, OECD, Paris, 2012 p.13.

种接触的记录少得可怜。谈判往往远离公众视线，尤其是在黑帮或叛乱团体给公司施压要收保护费或战争税的情况下。例如，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当地商业企业就屈从了这种压力，分别与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和尼泊尔毛主义共产党达成了交易，支付战争税以继续运营并减少针对其员工和运营的暴力威胁风险。⁵⁶

一个突出的内战情况下的例子是在莫桑比克，英国跨国公司罗荷集团(Lonrho)在1990年针对其设施的攻击之后参与了和平谈判过程。此前，罗荷集团已经打点了交战方以保护其五千三百万英镑的投资，但随着冲突的升级它也不再免于攻击。该公司的一名经理罗兰·“小”楼兰(Roland ‘Tiny’ Rowland)充当了中间人并提供了公司资源和飞机来帮助和平进程。据说该公司还捐赠了600到800万美元来帮助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Resistência Nacional Moçambican, RENAMO)转型成一个政党。⁵⁷

即使这种努力并非公司的核心业务，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公司已经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了多种作用。它们促进过沟通，在预期资源储量和未来经济潜力等方面提供过战略性的信息。通过其关系网和技能，公司充当过直接中间人并为支付和平进程而提供过财政资源。⁵⁸由于很多这种工作都是秘密的，除了引用传闻证据之外很难对其进行讨论。

除了这种敏感的行动之外，公司特别还在犯罪人和前战斗员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上与施暴者进行接触。在冲突后和暴力环境下，给数以千计的前战斗员或刑事犯罪人找到工作是一项人所共知的挑战。犯罪学家已经指出，比起仍然处于失业状态的前犯罪人来说，找到并坚持工作的前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要低得多。⁵⁹因此，作为一种推动和解的战略和让有风险的年轻人停止在街上游荡的手段，促进工商业界工作职位的产生成为了政府的重要利益。

56 Ameer Dhakal and Jhalak Subedi, ‘The Nepalese Private Sector: Waking up to Conflict’, in J. Banfield et al., *Local Business, Local Peace*, above note 18, pp. 411-412. D. Rajasingham-Senanayake, ‘The Dangers of Devolution: The Hidden Economies of Armed Conflict’, in Robert I. Rotberg (ed.), *Creating Peace in Sri Lanka: Civil War and Reconcili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1999, p. 61.

57 A. Vines, ‘The Business of Peace: “Tiny” Rowland,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the Mozambican Settlement’, in J. Armon, D. Hendrickson, and A. Vines (eds), *The Mozambican Peace Process in Perspective*, Conciliation Resources, London, 1998.

58 Achim Wennman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acemaking*, Routledge, London, 2011, p. 103.

59 NARCO, *Recruiting Ex-offenders: The Employers’ Perspective*, NARCO, London, 2003.

不过，商业企业也表达过某些保留。这包括像害怕声誉不好、害怕损害员工关系，或是前犯罪人或前战斗员对特定工作的必要的适应性和工作技能方面的担忧。⁶⁰在危地马拉，前黑帮成员重返社会的进程就遭遇了严重的系统性挑战：

年轻人不仅缺乏找到有意义的工作所需的基本能力，他们还缺乏在社会中生活的基本的人际交往技能。其他的障碍还有精神创伤和心理问题。鉴于如此之多的人拒绝与黑帮成员一起工作，一个严峻的挑战在于找到愿意给那些对改变持开放态度的黑帮成员一个机会、让其重新融入社会的合适的经济部门。⁶¹

作为哥伦比亚的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 (DDR) 努力的一部分，商业企业在创造工作机会方面的因应也体现了这种态度：

商业企业对前战斗员的行为及其适当技能的缺乏心存疑虑，这些前战斗员经常被认为有犯罪倾向。它们表达的担忧有雇佣前战斗员会在工厂已有的雇员中引起不安，并吓跑客户。其他一些人则认为仍然活跃着的武装团体可能会进行破坏或报复。⁶²

因此，将创造工作机会作为防暴减暴的一种方式更多的是纸上谈兵。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份最近的评论发现“将青年工作机会项目作为减少暴力冲突的一种独立工具的实证支持极为薄弱……而将创造工作机会作为包容性或综合性防暴减暴战略一部分的支持证据则要有力得多”。⁶³

正当性和自身利益问题

商业企业在防暴减暴项目中的多种作用背后的基础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工商业界的作用会成为减少武装暴力的一个可靠的助力。这种可靠性可能取

60 L. Capobianco, above note 21, p. 23.

61 Isabel Aguilar Umaña and D. Rossini, *Youth Violence in Central America: Lessons from Guatemala, El Salvador and Honduras*, Brief No. 4, Geneva Peacebuilding Platform, Geneva, 2012, p. 3.

62 Alexandra Guáqueta, 'Doing Business Amidst Conflict: Emerging Lessons from Colombia', in J. Banfield et al, *Local Business, Local Peace*, above note 18, p. 298.

63 Oliver Walton, *Youth, Armed Violence and Job Creation Programmes: A Rapid Mapping Study*, Norwegian Peacebuilding Centre, Oslo, 2010.

决于工商界在大部分当地人眼中的正当性、其统一行为的能力，及其对社会参与的态度和这方面的过往经历。⁶⁴商业企业在防暴减暴项目中的信誉取决于其在特定环境下的过往行为。比如说，大规模商业企业投资（如采矿、筑坝、农业）的负面影响已经造成了工商业界、社区团体、有的情况下还加上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又会反过来使得人们很难主张商业企业能在防暴减暴项目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与商业企业信誉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是参与防暴减暴的公司被认为有多大程度的自身利益。在哥伦比亚，私营业者在和平建设中的参与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动机。⁶⁵这种观点让人想到这样一句俗话，即不管公司做什么，都必须要与其底线相关。所以如果防暴减暴项目不能在收支表上体现出其成果，那说到底这些项目就不太可能吸引公司太大的兴趣。但是，如果防暴减暴项目能体现出成果，它们就具有商业价值：较少的运营中断、较少的人受伤或被杀害，以及更好的国际声誉。更何况，如果武装暴力置重要的战略性投资于风险之境，那么通过直接与施暴者接触来应对这种暴力的行动会是迅速而极其实用的。在这种情况下，自身利益可能是公司真正会致力于减少和预防武装暴力的一个标志。

跨部门合作的契合点

本节我们的注意力将转向武装暴力视角在暴力环境中实现跨部门合作的战略潜力。商业企业和武装暴力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兴的课题，有着很多实际的研究和实践的机会，这些机会是基于将商业企业实践和武装暴力、和平建设、人权以及犯罪预防联系起来的相对发达的研究文献。本节将突出强调三个主题，在这三个问题上，特定背景中的商业企业、出资人和国内利益相关人可能会有共同的兴趣来支持武装暴力的减少和预防。这三个主题是跨部门合作的必要性，武装暴力的成本代价，以及民间的观测。

64 S. Tripathi and C. Gündüz, above note 40, p. 24.

65 A. Rettberg, above note 38, p. 1.

理解跨部门合作的必要性

关于有希望成功的做法以及传闻证据的文献资料显示，公司——其实跟政府或公民社会行为人一样——并没有能力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减少暴力或预防武装暴力。因此，重点并不是在于公司对防暴减暴项目的独立的贡献，而更多地是在于潜在的公司贡献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能够加强多个相关方的努力。比如，波哥大商会就明确将其努力置于更广泛的防暴减暴战略之中，并认为其贡献是在于产生信息、对安全状况的客观评估、参与社区安全项目的设计，以及发展加强机构能力的模型，来使得社区安全的巩固成为可能。⁶⁶

出资人中存在的这一认识也支持了用项目化的方式来打击武装暴力的有用性，即“一次性的外部调解或当地的冲突解决办法越来越难以对潜在的暴力紧张态势或正在进行中的暴力产生影响”。⁶⁷而且，现在的趋势已经不再是到处都用同样的方式实施范式性的项目，因为这样会忽视不同情况下的特定问题。⁶⁸

将商业企业置于较广泛的防暴减暴项目之中也与向“有建设性的伙伴”发展的趋势相应，即为在当地形成和受当地引导的计划和进程提供专业技能和建议。⁶⁹有建设性的伙伴与像《帮助脆弱国家新政》(New Deal on Engagement in Fragile States) 这样的出资人指南中的当地领导和当地所有权条款相关。

很多和平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行为人将工商业界看做是暴力和脆弱环境中的一支积极的力量。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技能发展以及推动更有包容性的经济的投资并不仅仅就其本身来说有益。正如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探讨的，它们还有助于创造在安全、公民和经济权利、良政及其他对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建立共识的空间，并以此来缓解社会政治方面的紧

66 ICPC *et al*, above note 25, p. 9.

67 Chetan Kumar and Jos de la Haye, 'Hybrid Peacemaking: Building National Infrastructures for Peace, in *Global Governance*, Vol. 18, No. 1, 2011, p. 13.

68 B. Ganson and A. Wennmann, above note 51, p. 2.

69 Jennifer Milliken, *What the Peacebuilding Community Can Contribute to Political Transitions in North Africa and Beyond*, Paper 4, Geneva Peacebuilding Platform, Geneva, 2012, p. 12.

张。⁷⁰《新政》称创造工作机会和提高生活水平是和平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五个目标之一，这一立场为工商业界的行为人参与正式的和平建设和发展框架打开了大门。鉴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启示，联合国秘书长2012年的报告《冲突后建设和平》呼吁“私营部门和各建设和平行为体加强互动”，并呼吁与“基金会和私营部门合作，鼓励这些行为体为建设和平进程做出贡献”。⁷¹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出资者和国际组织改善其与在实地运作的工商业界的合作，并希望有机会通过跨部门合作让商业企业更好地在暴力和脆弱的环境中实现其战略利益。可以在减少和预防武装暴力方面加强这种合作的两个具体的契合点与武装暴力的成本以及通过观测点而获得的数据收集和环境监测的益处相关。

武装暴力的成本

更好地了解武装暴力对公司所造成的昂贵后果的程度及其分配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来加强商业企业的团结，并说服利益相关人相信冲突或刑事暴力会让他们赔钱。改善成本计算技术——比如会计、建模或条件价值评估法——将会使得人们能更好地理解武装暴力对商业企业造成的成本，尤其是关于通过防暴减暴项目能赚或者能省多少钱。⁷²

成本计算方面的工作可以是一个重要的助力，来增强其他相关方发起和平或反暴力的支持者及运动的努力。要聚集起工商业界对这种努力的支持经常是很复杂的，因为公司并不见得很清楚武装暴力对其运营所带来的成本代价大到何种程度。虽然不同的行业和公司受到武装暴力的影响并不相同——有一些甚至可能从不安全状态中获利——但既存的成本计算方式还没有完善到可以将成本与特定的行业或公司联系起来。⁷³在暴力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成

7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1.

71 联合国秘书长，《冲突后建设和平》，UN Doc. S/2012/746，2012年10月8日，第5页和第7页。

72 关于成本计算技术方面的综述，see GDS, *Global Burden of Armed Violence*, above note 1, pp. 91-97.

73 同上。

本影响方面，已经适用了一个使用会计方式的、很有前景的创新——即各种成本因素的收支表。⁷⁴对武装暴力的影响尤其敏感的行业包括零售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及航空业。⁷⁵

观测点

找到重要风险因素方面高质量的数据以及在暴力和脆弱环境中收集特定情势方面的情报对商业企业来说同样是一个挑战，就跟其对发展、政府或公民社会参与人是一个挑战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观测点模式可以是一个契合点，来培养多方合作，这种合作又可加强当地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的能力、以及基于证据的决策。观测点是临时的或永久性的机制、网络或机构，它们监测某一特定方面（比如暴力、灾难，以及生活质量）的发展情况。根据其职责，观测点可以做出数据、提供分析，以及为决策者给出建议以加强基于证据的决策。⁷⁶它们的使用很广泛，在拉丁美洲尤为如是。

就减少武装暴力的战略而言，观测点是一国内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倍增器。具体来说，商业企业可以在观测点的以下职责方面做出贡献：

- 就数据在决策中的作用以及决策监督开展并推动城市或国家层面的讨论，
- 在一国内建立数据创制以及数据分析的职业人士库，以及
- 组织试点性的项目来产生地方性的数据，要在次国家层面进行武装暴力的基线分析或环境监测，这些数据是必不可少的。

在大都市这样的城市环境中，大跨国公司也可能是观测点的推动者。在该领域最野心勃勃的、由工商业界引导的倡议是里约热内卢的运营中心。该运营中心是在里约市长的请求下由IBM设计的，它是一个全城性的系统，在一个帽子下面整合了来自三十多个机构的数据：

74 WHO, *Manual for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Costs of Injuries due to Interpersonal and Self-directed Violence*, WHO, Geneva, 2008.

75 Global Peace Index, *The Study of Industries that Prosper in Peace – the ‘Peace Industry’*, Global Peace Index, Sydney, 2008, pp. 14-18.

76 Elisabeth Gilgen and Lauren Tracey, *Contributing Evidence to Programming: Armed Violence Monitoring Systems*, GDS, Geneva, 2011.

IBM整合了其硬件、软件、分析和研究。它制订了一些手册，使中心的雇员可以将问题分为四个种类：事件、意外、紧急情况和危机。比方说，一个吵闹的聚会就是一个事件。人们在聚会上互相殴打就是一起意外。聚会变成了一场骚乱就是紧急情况。而如果有人在这场骚乱中死亡，这就是危机了。这些手册还一步步地列出了各部门应当如何处理像洪灾和泥石流等紧急情况的程序。⁷⁷

总体来说，观测点可以成为商业企业、出资人以及国内利益相关方的结合点。商业企业在观测点中的投资和参与可能成为与防暴减暴项目的一个重要连接因素。在有限信息或不良信息的情况下，观测点应对的是所有参与方的情报、数据和分析需求。而且，对于在特定地点发起多方进程而言，情报搜集和分析进程是很有益的主题。

结 论

本文就暴力和脆弱环境中的商业企业运营对武装暴力视角提供了一些探讨性的分析。一方面，本文试图让商业企业和“享有权利”的社区开始了解这一正迅速发展的实践领域；另一方面，本文旨在强调武装暴力视角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在暴力和脆弱环境中实现跨部门合作的潜力。本文考察了国际和本地的、从事正当合法的商业交易的大小公司。本文是以这样一个假设为起点的，即多方——包括世界银行、日内瓦宣言组织和经合组织——都已注意到的武装暴力的新模式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视角，传统上，这一问题是在“商业企业与和平”或“商业企业与冲突”这种研究线索的语境下讨论的，其基础是将武装暴力的概念理解为与国内或国际武装冲突相关。

总体而言，理解商业企业在防暴减暴项目中的作用意味着理解商业企业实践在暴力和脆弱环境中是作为应对复杂情况和风险的很多行为人之一而发挥作用的。这关乎界定商业企业在更大的防暴减暴项目中的具体作用，而不是单独的公司慈善。打击武装暴力需要多种利益相关方的努力，没有任何一

77 Natasha Singer, 'Mission Control, Built for Cities: I.B.M. Takes "Smarter Cities" Concept to Rio de Janeiro', in *New York Times*, 3 March 2012.

方仅凭自己就可以减少或预防武装暴力的持续性。这一观点又跟一个更广泛的趋势相关，即趋向于作为当地努力的有建设性的伙伴，以及趋向于采取对特定环境敏感的项目设计。

商业企业在武装暴力视角的特定要素方面发挥了多种作用。比如，慈善方面的投资或能力建设长期以来就是公司－社区关系的一部分，并与对受武装暴力伤害或不利影响的个人及社区的关注相契合。公司还可以与武装暴力的现实实施者或前实施者直接接触，对和平进程的支持或为前战斗员或前黑帮成员创造工作机会就是例子。

归根结底，武装暴力视角可以发挥类似一副新眼镜的作用：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既存的实践，并有助于让商业企业在暴力和脆弱环境中的参与更具持久性，而同时又能改善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之人的生活状况。